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张 汝 伦

—

初看上去，“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伪问题。现代中国人所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著作），当然就是现代中国哲学，怎么还会有“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既然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不会是无的放矢，总是有所指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认为中国哲学尚未现代化，或不够现代化，而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哲学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历史的今天？冯友兰、金岳霖、张东荪、贺麟，甚至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他们的哲学难道不是现代中国哲学？如果是，那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在他们那里就已经现代化了，又何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或曰，他们的哲学的确是现代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在他们那里现代得还不够，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就得转换为：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或者说，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讲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已有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两个可能的含义：一是使传统哲学现代化；二是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语言等等）现代化。前者表现为到底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问题，后者表现为强调引进西方哲学的方法（尤其是逻辑分析方法）和概念的重要。

先讲第一个含义。冯友兰先生在他《新理学》的绪论中曾经针对他的新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提出所谓“接着讲”和“照着讲”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冯友兰，1986年，第5页）何谓“接着讲”？何谓“照着讲”？冯友兰自己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倒是蒙培元先生对此有个阐发。他说“照着讲”是哲学史的方法，“接着讲”是哲学的方法。“照着讲”是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参见蒙培元）照此看来，目前我国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照着讲”，而不是“接着讲”；是纯粹哲学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学的研究。

按照德国一些哲学家的看法，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就是说，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不能截然分开。物理学家不了解物理学史不会妨碍他成为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但哲学则不同。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内容的丰富和复杂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它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进行不断的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对哲学史一无所知，一上来就大胆提出一整套“自己的观点”的“哲学家”，只能永远是外行，而进不了哲学的殿堂。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合理性根本在于它的存在论根据。意欲究天人之际的哲学严格来说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否则就难以解释它的产生，以及在人类文明中的

特殊作用和地位。哲学史属于哲学，就因为哲学史作为人类存在的观念形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人类历史无非就是人类的存在。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因为哲学史不是哲学的历史学，而是永不停止的哲学本身。正如一个人的生命史不是外在于他的东西，而正是具体的他本身一样。

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哲学的研究，而不是像物理学史或文学史研究那样，纯粹是一种客观知识的研究。当然，人们可以把哲学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来研究，但严格说来，那已不是哲学的研究，而是对哲学的历史的研究；那种研究固然也有其价值，但却不是哲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以哲学史研究的形式来从事哲学研究，却是中外哲学史上的常见现象。中国哲学史上王弼对《老子》的注疏，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西方哲学史上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评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海德格尔的《尼采》，都是这方面的显例。这种对哲学史的哲学研究必然是一个和哲学史的建设性的对话关系，一个创造性的阐述过程，而不是客观的叙述过程。它表现为对传统基本哲学问题和主题的开掘和深化，并通过这种开掘和深化将问题进一步展开，而不是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整理陈述一下。这才是冯友兰“接着讲”真正的意思。

然而，哲学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哲学从来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珍玩，而是人类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的智慧思考。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参见黑格尔，第12页）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宋儒对先秦典籍的研究，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研究，列奥·斯特劳斯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无不如此。没有人会把他们对哲学史的研究看作是史的研究，而都知道这是他们阐述对自身面临问题的思考的一种特殊方式。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二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解决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列奥·斯特劳斯是后者的典型，而海德格尔则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接着讲”的做法并不是借古人杯酒浇自身的块垒，而是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事实证明，正是这样“接着讲”的哲学家，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状况来看，这样“接着讲”的人不多，更多的是“照着讲”。用现代语言写出来的“照着讲”的东西是否真能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以及“本意”是否可及，在哲学释义学看来都是成问题的，但这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想说的是：“照着讲”的哲学（史）研究使得传统哲学真成了过去的东西，而不是活在当下、给当代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提供无穷的源头活水的东西。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照着讲”中国传统哲学，却越来越少看到像冯友兰、金岳霖那样用传统哲学的概念来“接着讲”现代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在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康德、黑格尔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自己在读古书，相反，在谈论当代问题时会不断引用他们的话以资佐证。然而，当我们读孔孟老庄或刘蕺山、戴震时，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固然也会用“天人合一”之类的话来批评现代人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我们能说传统中国哲学的话语即使在中哲史研究的专业领域之外也生机勃勃，是我们思考现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时不可或缺的资源，或是成为我们哲学的基本语言，就像西方古典哲学家的思想一样吗？青年学子更多地被西方哲学所吸引，难道是因为所谓的中国哲学落后、不严密、缺乏逻辑分析，或仅仅是为了赶时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原因？

二

人类之所以需要哲学，或被哲学所吸引，从根本上说，不纯粹是出于学术的兴趣，更主要的是出

于对宇宙人生大问题的根本困惑。人们需要哲学给他们解惑，需要从哲学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在。哲学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个需要，人们也就不需要它，哲学也就死了，而最多成为少数专家手中把玩的古董。当人们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时，是否意味着人们认为：传统中国哲学之所以吸引力在下降，是因为它的既有形态无法适应现代的需要，因而需要加以“现代化”，就像中国必须现代化一样？

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看的，包括现代中国哲学的先驱冯友兰。冯友兰认为，现代中国经历着有史以来第二次大变革，即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应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这一转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是因为传统哲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蒙培元，第17页）那么，什么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冯友兰自己说过哲学无所谓新旧，因为“哲学可以不切实际，不管事实”（冯友兰，1986年，第12页），“哲学既只靠思，思之能力，古今人无大差异，其运用所依之工具，又不能或未能有大改进，所以自古代以后，即无全新底哲学”（同上，第18页）。如果这样的话，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的哲学又从何谈起？“接着讲”又如何讲法？

很显然，冯友兰“照着讲”和“接着讲”都是针对哲学的内容而不是方法的。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冯友兰的“接着讲”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在冯先生看来，舍此没有别的方法。这一点，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现代理性主义虽然出现在西方，但又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现代哲学共有的。”（蒙培元，第18页）这其实是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第二个可能的含义上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但这有可能误会了冯友兰的意思。

冯友兰的确一贯提倡理性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对西洋哲学的介绍太偏于英美方面，是以经验主义为主，但“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冯友兰，1984年，第297页）可是他似乎并不认为“理性主义”就是“逻辑分析”，更不认为只有“逻辑分析”才能产生新的哲学，因为“哲学是靠理想，不如科学之靠工具、实验与技术。理性与工具等的演变，是不相同的。真正的时代哲学，系将过去的思想与当时的事实问题接近，把活的问题与思想打成一片，这才是哲学家应有的责任，也就是新哲学的正鹄”（同上）。除去这段话如何与上引的他所谓“哲学可以不管事实”一致的问题不说，应该说冯友兰并不会认为“逻辑分析”就是理性主义，也不会认为逻辑分析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由途径，更不会认为“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蒙培元，第18页）。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自己的哲学就有可能被人以逻辑分析的方法所“取消”。（参见贺麟，第51-52页）事实上恐怕也没有人会认为“现代哲学”就应该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相反，倒是当年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人物卡尔纳普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指责海德格尔哲学反而留下了笑柄：被他视为不讲逻辑分析的海德格尔哲学，恰恰是现代哲学最重要者和对哲学贡献最大者之一。

其实，逻辑分析的方法并非现代理性主义的特征，而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就出现在西方哲学中，而且在传统中国哲学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当然，传统中国哲学的确不太讲逻辑分析，这可能更多与中西两种语言的特征有关，而与中西思维水平的高低无关。如果逻辑分析从古就有，而不是工业时代或现代哲学独有的特征，那么，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讲中国哲学或改造中国哲学，结果就未必是现代中国哲学。既然西方人从来不把他们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哲学视为过时的哲学，我们又为什么

要认为传统中国哲学是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而要将其现代化呢？如果冯友兰真的认为哲学无所谓新旧的话，他就不应该认为传统哲学应该现代化。

然而，冯友兰所谓哲学无新旧，是说哲学的道理大致相同，“而各时代之哲学家，各以其时代之言语说之，即成其时代之新底哲学系统”。（冯友兰，1986年，第18页）原因有三。首先，“一时代的哲学家，必是将其自己所见，以当时底言语说出或写出者。因其所见，不能完全与前人不同，所以其哲学不是全新底哲学，但其所说所写，是其自己所见，所以虽有与前人同者，但并非转述前人”。（同上）其次，“今人之新经验之尚未经哲学分析解释者，一时代之新哲学家，可分析解释之……一时代之新经验之分析解释，亦即可成为一时代之新哲学。”（同上，第19页）第三，“人之思之能力虽古今如一，而人对于思之能力之训练则可有进步。逻辑为训练人之思之能力之主要学问。今人对于逻辑之研究，比之古人，实大有进步。……用训练较精底思之能力，则古人所见不到者，今人可以见到，古人所有观念之不清楚者，今人可使之清楚。”（同上，第9页）“由此之故，一时代虽不能有全新底哲学，而可有全新底哲学家，较新底哲学。”（同上，第20页）如果说冯友兰有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想法，也不出上述三点看法，虽然他并没有说“现代化”，而只是说哲学“新”的可能性。

第一条是说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论述基本的哲学问题，第二条是说哲学家必须分析他的时代经验，第三条是说后来的哲学家逻辑方面要优于前人。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化（如果他有此想法的话）的基本想法，这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发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讨论分析现代的经验和问题，必须受良好的逻辑思维训练。由此产生的哲学，才是现代中国哲学。由此看，我们恐怕不能说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参见蒙培元，第18页）即使逻辑分析是西方哲学的方法，也不等于是西方哲学，更谈不上与现代西方哲学划等号。正如蒙培元先生正确指出的，冯友兰从来就不主张中国哲学的西化，而是主张中西哲学“互释”。（同上，第19页）因此，如果他主张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话，他不会认为使用西方的概念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换言之，他不会在哲学领域主张西化就是现代化。

如果说冯友兰主张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话，那么从上述他关于哲学发展的三点看法中我们可以推出：在冯友兰眼里，现代中国哲学或现代化了的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中国哲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发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语言应该在逻辑上更加清晰和严密。这些应该说都是正确的。然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三

上述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如果说关于“现代化”的一般概念人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那么关于什么是“哲学现代化”恐怕人们只能否定地一致，即都同意它决不是传统哲学，但不太会一致地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现代化”一词一般指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首先在西方然后在全世界发生的社会生活方式、制度、意识形态、物质文明等方面的基本变化过

但这只是就主观而言。从冯友兰始终坚持东西文化的差别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来看（参见《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第458页），中国哲学的近代化（现代化）显然应该是西化，至少上述他的东西方文化差别观逻辑上蕴含这个结论。虽然冯友兰声明他把“近代化”主要理解为“产业革命”，但是很显然，近代西方哲学就是产业革命的哲学，而中国哲学若要近代化的话，当然也应该是这种哲学，即近代西方哲学。

程。冯友兰把“近代化”理解为“产业革命”虽不够全面，但也并不错。使一个国家现代化一般指使它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使它工业化等等。但“哲学现代化”是什么意思？

冯友兰那一代人往往把它理解为理性化。对逻辑分析推崇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传统没有，而是因它是现代理性的体现。理性主义当然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只是将它理性化吗？难道传统中国哲学是不理性或非理性的？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另外，近代西方哲学固然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呢？我们如何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的近代西方哲学的致命批判？与近代西方哲学判然有别的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化的哲学还是非现代化的哲学呢？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有关，因为我们是有了西方哲学这个他者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我们最多只能说它的表述不太合适。不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是“中国哲学如何是现代的”，也就是冯友兰三点看法中最重要的一点，如何将现代的问题与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相联系，或者说，如何通过思考传统哲学问题来思考当代的问题，或者用冯友兰的话说，“把活的事实问题与思想打成一片”，如何让人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时候就像在谈论西方传统哲学时那样，不觉得只是在谈论过去的问题，这些才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

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应该西化才对，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将现代化理解为西化。哲学现代化（姑且不论这种提法是否合适）尤其应该如此；离传统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通过与传统哲学问题相联系而实现哲学现代化，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最不能西化，一旦西化了就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就像今天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尽管他们使用的是中文，却做的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同样，仅仅外在地用一些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传统哲学也不等于把它现代化。对于哲学真正重要的不是概念，而是问题，是问题赋予概念以意义。离开了问题，概念就成了修辞的手段。现代中国哲学必须从传统哲学中找出，或不如说创造出自己的身份。西方哲学不可能给它这个身份。

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只是“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照着讲”只能回到过去，“接着讲”才能面向未来。然而，“接着讲”不是离开传统，而是要让自己的问题“接”上传统，同时也让传统“接”上现在的问题，这样，传统就不再是“死”传统，而成了“活”在今天的传统。或曰：既然是“接着讲”，还要传统干什么？答曰：哲学不能凭空创造。如果说哲学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那么这个“思想”其实不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思想，是历史的人类思想，就像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存在一样。就像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遗传基因一样，哲学史是哲学的遗传基因。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在思想的真空中思考他的问题，他只能用他所掌握的全部哲学史的资源来思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家来说，西方哲学实际上也渐渐成了他所拥有的哲学史资源的一部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不用西方哲学概念的传统哲学家。这就决定了今天我们即使是“照着讲”，也不可能是原汁原味了。就像现在修缮古建筑所谓的修旧如旧，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拥有历史上的建筑材料。西方哲学的因素会使我们的传统因子发生某些变异，但却不可能完全取代它。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只能是“中西互释”，而不能是“汉话胡说”或“原汁原味”。

其实人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早就这么做了。试举一例。在《蓟汉微言》中，他说孔子为道为学，一以贯之，只忠恕而已。弟子不解地问道：为道贯以忠恕，是己。彼为学者，何与忠恕事邪？这弟子大概也是觉得忠恕概念与道德行为有关，而与学无关。章太炎答道：举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谓恕。显然，章太炎在此把“恕”释为推理。然后说：“顾凡事不可尽以理推，专用恕术，不知亲证，于事理多失矣。救此失者，其唯忠。忠者，周至之谓，检验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斯

为中矣。今世学者亦有演绎、归纳二涂，前者据理以量事，后者验事以成理。”（章太炎，第 27 页）在这里，章太炎一方面以忠恕来释归纳和演绎，另一方面又指出演绎（纯理论和逻辑的推理）的不足在于疏于特殊性，同时通过强调归纳本源的亲证性指出它对演绎的补救，从而创造性地改造了传统的忠恕概念，传统的哲学概念和语言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遗憾的是，章太炎之后，致力于将传统哲学概念和语言推陈出新的人不多。但这却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必须能够将现代的问题引进传统的文本。现代西方哲学家能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么做的关键，在于借鉴哲学释义学的成果，破除对“本意”和“原义”的迷信和固执。哲学家在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时当然会有“本意”，但这“本意”只有文本发生学或创造心理学的意义，而没有哲学的意义。几乎每个人都有言不达意的经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本有其独立性，它与作者的“本意”之间是有距离的，不可能完全吻合。而后人只能根据传统哲学的文本来理解传统哲学，我们无法起古人于地下，来核对我们的理解是否符合他的本意。当然，在很多时候，作者的确在文本中对自己的本意交代得很清楚。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解释？这就是文本作为语言作品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意义不能与作者的原意划等号。文本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增殖和伸缩。在此意义上，讨论汉儒和宋儒哪个的解释更符合孔孟的原意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哲学的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他们的解释增加了什么。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对传统哲学进行歪批三国式的任意理解和解释。文本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它虽然不能等同于作者的本意，但它的语言性和它的历史性决定了它有明确的释义范围和界限，不能任意胡乱解释。

在文本解释的问题上也许说合理的解释和不合理的解释比说正解和误解要好。文本解释不像解数学题那样，不是对就是错。我们很难说朱子和阳明对孔孟的解释哪个正确哪个错误，我们至多只能说哪个更为合理。而我们的判据，必然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说它是主观的，是说我们一定是根据我们对原始文本的理解来判断的；说它是客观的，是说我们毕竟不能篡改或伪造原始文本。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类似自然科学学科的标准答案来简单对照，然后作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当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说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完全正确，前提是文本必须像数学命题一样毫无歧义，毫无历史文化和当代的涵义，因而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像对照一个标准答案那样与它相对照。但这可能吗？如果可能，还有理解和解释的必要吗？

那么，什么是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首先不能违背文本的语义规定和历史规定，而是必须在语义允许和历史可能的范围之内。没有语义根据和历史根据的任意解释决不是合理的解释。例如，我们既不能把《周易》解释为量子力学理论，也不能把王船山说成是后现代。其次，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文本的复述或转述，而是以自己的语言加以阐发。疏通文本式的解释者冯友兰称其为“注疏家”：“哲学家是自己真有见者；注疏家是自己不见，而专转述别人之见者。”（冯友兰，1986年，第 18 页）从哲学和哲学发展的角度看，用自己的语言对传统哲学思想进行创造性阐发的解释显然更称得上“合理”。第三，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将自己的问题融入历史思想中，或从传统思想看到解决当代问题的新的可能。只有这样，传统才能生生不息，成为我们历史存在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那些从现代学院学术眼光看来似乎是“中规中矩”而实际是“亦步亦趋”的解释往往留不下来，而被同时代康德研究专家认为是“野狐禅”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释义学研究，却被今天大部分康德研究者认为是康德研究的经典。

如果上述三条关于解释的合理性的规定能够成立，那么将现代的问题与传统的思想相联结，让传统思想在面对现代问题的挑战和回应中创造性地演变、丰富和发展，就应该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主要涵义了。事实上，从最早一代现代中国哲学家到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者，都一直有人在这么

做，只是它还未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所以才有“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的不断提出。

但这还只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被不断提出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被不断提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无法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参与一般的世界哲学对话，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往往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联系在一起。毋庸讳言，今天的世界哲学舞台基本上被西方哲学话语所统治，不懂或不会这套话语，既听不懂别人讲什么，也无法使自己讲的让别人懂。所以，中国哲学若想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所言说并有人听，必须用别人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说，同时又不因而失去自我。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命运。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在学会用别人的哲学概念和话语向他们说我们的哲学时，也用我们的哲学改造他们的概念和话语。“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56页）观堂先生当年此语，莫非即此之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西互释”，尤其是哲学概念和话语的互释就十分重要了。在这里，简单的“汉话胡说”或“胡话汉说”都不解决问题，因为哲学概念和话语决不是单纯的表达形式和工具，而总是和哲学的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概念和话语所表达的问题想透，我们才能真正自如而不离谱地“中西互释”。这也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关键。与之相比，逻辑分析或“概念游戏”的训练和实践则是次要的。哲学包含逻辑分析，但决不等于逻辑分析。逻辑分析只是哲学的诸手段之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需要加强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考虑到传统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很弱，强调它的重要性是对的，但它不应该是一个绝对的要求。中国哲学未尝不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其实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表述风格的迥然不同也是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却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理想国》、《忏悔录》、《精神现象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逻辑哲学论》、《哲学贡献》，这些风格截然不同的经典著作清楚地告诉我们，哲学没有一定之规，哲学是自由思想的产物；它需要缜密的思索，更需要不羁的想象。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需要方法论上的更新，但仅仅使用现代的方法还不足以使它成为真正现代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应该用现代的语言思考现代的问题，哪怕是研究传统哲学，目的也不只是要“照着讲”，而是为了“接着讲”。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同行的榜样，研究古人是通过古人来思考今天的问题，从而也光大和发展了古人的智慧。因此，它不能是单纯“哲学史”的研究，而应该是“哲学”的研究。这样，中国哲学才能在现代化的同时也实现世界化，即用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哲学话语来讨论今天人类的问题和人类永恒的问题。

参考文献

《闾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1994年，谢遐龄 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冯友兰，1984年：《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贺麟，2002年：《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1982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蒙培元：《“接着讲”和“天地境界”》，载《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总第5辑。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198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

章太炎，2000年：《蓟汉三言》，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冯国超

ABSTRACTS

Practical Theory of Man: the Final End of Marx 'Philosophy

Zhang Kuiliang

The German Ideology is the symbolic production of the birth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is the crucial step for Marx and Engle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s of Feuerbach 's intuitive materialism and build new practical materialistic worldviews. As the coming of the book 's 160 anniversaries,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its profound meanings of practical science of hum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rying out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ing views. Human beings is always the root of the world both in the meaning of ontology and axiology. Only proceeding from human conditions, can the human-belonging nature be understood correctly in the man 's activities. Moreover, human and world are not immediately existent and consist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tory, they are the creation of the practices, human and their practices form the whole real world. As the outcome of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mmunism incarnates as the historical courses of "changing world", it is the ultimate end of the hum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ives and practices is the best commemoration to *The German Ideology*.

On "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Philosophy "

Zhang Rulun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sounds rather unintelligible. Sinc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s have done philosophy so much, what does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an? For some people, it means that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so modern; for the other people, the mean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obsolete. However, since people identify modernization with Westernization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he problem is far from its solution. What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means is to connect modern problems with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ation, enrich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thought in its confron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times. We need not only the renewal of methodology, but also Chinese discourse of philosophy.

A Modern Survey of the Dimensions of Taoist and Legalis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hangyuan li Ga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oist apriorism and Legalist experimentalism as to human nature lies in that Taoists seek after the reality of humanity, thus establishing the true-fals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hile Legalists seek after the advantage of humanity, therefore developing the advantageous-disadvantageous theory. Their dif-